

《大商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商人》

13位ISBN编号：9787508612614

10位ISBN编号：7508612612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傅国涌

页数：31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大商人》

前言

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我的追寻之旅 长期以来，中国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商居末位，直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古老封闭的大陆才开始长出近代工商业的嫩芽，而真正深刻的变化还要等到十九世纪末震动整个天朝大国的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容许日本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任意设厂，给当时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巨大的刺激，清政府也从那时开始允许民间办厂。“实业救国”、“兵战不如商战”，就是那个时代走在前面的中国人发出的沉痛呼声。在读史过程中，我渐渐感到，以往我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企业家对

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张謇、荣氏兄弟、范旭东、穆藕初、刘鸿生和卢作孚，正是他们代表了近代工商业的方向。

商之大者，为国为民，一群以实业报国为终生理想的大商人，铸就了现代工商业的传统和灵魂。掀开历史的一层层帷幕，这些曾叱咤风云大半生的企业家们，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极富个性特征的传统。张謇创造的“南通模式”，造厂力求其快的“荣宗敬速度”，小鱼吃大鱼的“卢作孚神话”，“永久黄”的团队精神，穆藕初引入的科学管理法，刘鸿生用西方谚语概括的感悟式格言……这一切都是中国企业史上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是后世企业家值得珍视的遗产。

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不在“红顶商人”胡雪岩身上，不在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与徽商身上，他们都只悬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身上还没有笼罩近代的曙光。这个根也不在洋务运动后期崛起，曾在晚清中国盛名显赫的盛宣怀、唐廷枢等人身上，他价或是官商，或悬买办，最终未能超越身份的限制，踏入现代的门槛。这个根在那些开倒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和刘鸿生，正是他们代表了近代工商业的方向。

“他（张謇）尽毕生精力搞起来的通州工业今日之发达，足以证明他是中国有力的实业家，再加上他的才学和声望，他今后将会活跃在中国的政界或实业界的。”

“荣宗敬兴办实业，历数十年，功效昭著，民生利赖。是次日军侵入淞沪，复能不受诱迫，避地远引，志节凛然，尤堪嘉尚……”

“我们（范旭东）办实业的人，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和为人类服务的精神，我们为救国家的危亡而办实业，在环境许可之下，不问事业的大小，努力地往前干去。”

“以外貌言，无有知其（穆藕初）为中国之棉业大王者。君为人和蔼，交友以信，举止正大，见识宏远，中西人士无不乐于相处。噫！如君之才高德备，诚可谓中国第一人物矣。”

“我（刘鸿生）的全部理想，只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我总希望把我的企业从一个变成二个、三个，越多越好。”

“卢先生（卢作孚）是中国一位大事业家，一手经营北碚，艰苦缔造并主持民生公司。卢先生简单、朴素、刻苦、笃实，不铺张，不夸大，充分表现了中国事业家的风度，其气魄已先声夺人。”

作者以历史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度，用平实的语言详细记录了明清开始、经历民国时期直至中国建国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本土的企业家的成长及兴衰。书中用6个清末民初最为著名的实业家的事迹，来追寻近代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商业传统，其中包括了张謇、荣氏兄弟、范旭东、穆藕初、刘鸿生、卢作孚。作者对每个人物的描写史料翔实、内容细致，不但有对各企业家生平的记录，更是对中国近代企业的一次系统梳理，通过人物的命运来展现中国近代商业发展、商业智慧、商业教训。

中国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和刘鸿生，正是他们代表了近代商业的方向。

在现今历史题材比较热的时候，从工商业的角度来重新梳理当年的历史，从中可以发现，在那个混乱的历史年代，中国的工商业竟然曾经发展到如此进步的一个程度，中国的工商业界，竟然出现过如此科学和民族的管理方式，竟然会有如此远大的抱负和眼光……学习并了解历史，并以史为鉴，从中学到适用的工商业之道，将是让读者意想不到的一大收获。

《大商人》

作者简介

傅国涌，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现在杭州家中读书写作。主要关注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命运史、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近代企业传统等。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文人的底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历史深处的误会》（东方出版社2006年10月）《笔底波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过去的中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叶公超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追寻失去的传统》（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

书籍目录

我的追寻之旅近代企业家的五个来源外在因素：制度的不可抗力内部因素：企业家精神重温企业家的本土传统第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与大生集团 世界地图上的“唐家闸” “机枢之发动乎天地” 大生成功的五大原因 大生元老和张三、张四兄弟 第一次大生股东会 江北“小上海” 垄断：大生二厂、三厂和副厂 “儒者本分”：通海垦牧公司 “父教育”和“母实业” “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从立宪到共和 “中国有力的实业家” 名副其实“张南通” “一花一谢皆关心” “伶工学社”：五线谱上的毛笔和钢笔 “南通模式”和王牌“千生” 黄金时代的消逝 大生失败原因：“二无二差” “即此粗完一生事”第二章 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荣氏兄弟和茂新、福新、申新集团 申新搁浅：荣氏企业大危机 实业部乘人之危：“可怜大王几被一班小鬼扛到麦田里去” 四台石磨起家：从面粉开始 “面粉大王”：“兵船”走向世界 “纺织大王”：“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 荣宗敬的四项原则 雪上加霜：申新七厂拍卖风波 落井下石：宋子文的如意算盘 “劳工自治区”和“大无锡”之梦 “爱国之心，未敢后人” “一生知己是梅花” “雄才创业”和“老成持守” “大迷”和“二迷” “有力量要贡献社会” “三足鼎立” 绑架事件：宁可牺牲个人保全事业 “我是事业家，不是资本家”第三章 书生之见VS发财之念——范旭东和“永久黄”团体 久大精盐公司 军阀绑票勒索 永利碱厂 纯碱价格战：MBA教材的经典案例 “永利是高明的灯塔” “当了裤子也要办黄海” 亚洲第一大厂 “新塘沽” “谁人肯向死前休” 三条自我约束原则 社会的中流砥柱 “三位一体”中的“李老太爷” “三位一体”中的“国宝”侯德榜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 盛着塘沽沙的搪瓷杯第四章 一掷万金穆藕初 “中国第一人物” 从德大、厚生到豫丰：“佩六国相印” 纱布交易所：没有股份的理事长 世界不问你是谁何人，只问你能做何事 “手散黄金培国土” 毕生最得意之教育事业：中华职业学校和位育小学 情系昆曲 倡斗黄头鸟 从政非志趣所在 “新兴商人派”代表 延安统战对象 苏州城外“穆家坟”第五章 “从一个变成两个、三个，越多越好”——刘鸿生和他的企业集团 “O.S.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 “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 “火柴大王” “象”、“马”、“龙”之争 “煤业大王” “我并没有让我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筐子里” “企业大王” 六个保镖和七只生鸡蛋 点金石：经营之道与用人之道 “在日常工作中发挥个人的才能” “在上海我是大老板，到重庆变成小伙计了” 日落西山 “我总希望把我的企业从一个变成两个、三个，越多越好”第六章 谁创造了“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卢作孚和民生公司 宜昌大撤退 药王庙创世纪 小鱼吃大鱼的“卢作孚神话” 大制度和小细节 “公司魂”：民生精神 朝会和《新世界》 影响和帮助卢作孚的人 “你的跟班比你穿得漂亮” 没有私产的总经理 读书和看戏 “我从来不想过官瘾” “选卢作孚做行政院长吧” “这东西不男不女” “民生公司的股票交给国家”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大商人》

章节摘录

第一章《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与大生集团 世界地图上的“唐家闸” 唐闸原叫唐家闸，更早叫唐家坝，本是个汲汲无名的小地名，如果不是1896年状元张謇选中这块地方办厂，唐闸也许不会进入历史。南通盛产棉花，通州棉和海门、崇明的棉花都很有名。唐闸离南通城6公里，周围一马平川，到处是棉田，周边农家世代代有纺纱织布的传统，通扬运河在此缓缓流过，港闸河直通长江边天生港码头，舟楫往来，水路十分便利。张謇买地时，唐闸还很荒凉，地价很低，他在唐闸的陶朱坝一带买下1.7万步地（约68亩），只花了1250两。以

《大商人》

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工业真正的本土源头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张謇、荣氏兄弟、范旭东、穆藕初、刘鸿生和卢作孚，正是他们代表了近代工商业的方向。商之大者，为国为民，一群以实业报国为终生理想的大商人，铸就了现代工商业的传统和灵魂。掀开历史的一层层帷幕，这些曾叱咤风云大半生的企业家们，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极富个性特征的传统。张謇创造的“南通模式”，造厂力求其快的“荣宗敬速度”，小鱼吃大鱼的“卢作孚神话”，“永久黄”的团队精神，穆藕初引入的科学管理法，刘鸿生用西方谚语概括的感悟式格言……这

精彩短评

- 1、值得一读，看完总有中淡淡的哀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为他们的经历
- 2、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以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张謇
- 3、克服越大的困难，获得越大的技能加成
- 4、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 5、商人才是我追逐的目标
- 6、读了，读了前言
很牛X啊
- 7、这本人物志写的真好
- 8、一段不大受关注的历史，一些可称之伟大的人物。美中不足，文书稍乱。
- 9、神马叫实业家？
- 10、多好的故事啊，唏嘘不已，改编成几部经典剧目或者电影，多好啊，可以很多东西都断流了。
- 11、：
K825.38/2263
- 12、这本书一读，才知道近几年读的比如稻盛和夫《活法》，科林斯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中所描述的企业家领导都达不到张謇和卢作孚的境界，乱世之中，一个人的愿力如此强大，实业救国，纯粹而理性，能抛开个人得失，一心为国为民。如今，这样的企业家哪里找？
- 13、傅先生的书向来值得读。我想即使对这段历史不感兴趣也值得一看，有些被遗忘的应该被记得。
- 14、“中国历史每代的成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大多会被清零，用IT的术语，就是给格式化了，然后大家从头再来，从零做起。中国近代三代企业家，连同他们的经营方式，经验和企业文化，乃至他们的精神、抱负，最后也都遭到了格式化的命运。”（张鸣）
- 15、还是比较客观的书，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从一百多年前到现在，办实业，没金融、没政府人脉，估计是很难的。这六个企业家，大多怀抱理想，自己全心付出，倒是没怎么享乐，跟现在的大“资本家”不太一样。另外，对荣氏兄弟这幅对联很有感触：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 16、范旭东、卢作孚等企业家令人钦佩！
- 17、都是兴邦商人的干货知识，虽然用经济学的眼光看这本书总感觉怪怪的。
- 18、民国时期的著名企业家之传记，写的非常不错。可以作为《跌宕100年》的参考书。

1、看过此书，我比较推崇穆藕初卢作孚，他俩给我印象也深。对比现在国内的企业经营者，在意识上、认知上还是很欠缺，于是也没有给读书人、文化人、学术人更多的应有的尊重与爱戴。财经作家吴晓波，就前不久山西煤矿又渐被国企吞食，说民企阶层还没有觉醒，别说煤老板没有觉醒，在我看来就是很出所谓学历很高的都没有觉醒、没有那种意识，倘若说这世界上没有谁会是一个孤岛、没有谁能独善其身，这话大了点，但看看民国时期的穆藕初，资助了多少读书人，如罗家伦、方显廷，现在有谁有这种意识与胸怀呢？民国时期的实业家——卢作孚，在开始做长江船运时，大小中外公司林立，竞争何等激烈，而他卢作孚却可以游刃有余、从容不迫、举重若轻、以小博大、化零为整，把民生船运公司经营为船运界的老大。这是何等的境界，何等的智慧啊。这年头太缺少这样的企业经营者了，现在的经营者懂战术的多，懂战略的少；懂事的多，懂人的少；懂务实的多，懂务虚的少；懂权术的多，懂修为的少；懂经验的多，懂反思的少。整个一个经验主义的年代，一个方法盲的年代，一个缺少想象力的年代，也注定了是个平庸而反智的年代。

2、《大商人》：工商业也有春天从百年中国言论史三部曲《追寻逝去的传统》、《笔底波澜》、《文人的底气》到新近出版的《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近代史学家傅国涌先生完成了他从言论史扩展到工商史的写作夙愿，正是借助他和谢泳深埋史料文献堆又不忘立足现状的言说，一种带有私人体温的历史研究颠覆了我个人对民国历史的印象，而现今的民国热也主要源自他俩身上，外加余世存世说新语体的那本《非常道》，一时洛阳纸贵，一时思想启蒙之光星火燎原。在众所周知连一颗铁钉都造不出的旧社会里，我信手用一组资料来试探、瓦解你意识深处的教育烙印：1929年，中国第一辆汽车，65马力，载重为1.8吨，沈阳辽宁迫击炮厂；1919年，中国第一架投入使用的飞机，甲型一号水上飞机，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1920年，中国第一艘万吨轮，排水量14750吨，远洋运输轮，美国订单；1924年，中国第一台重型柴油机，5种规格的低速重型柴油机，上海新样机器厂；1915年，中国第一家车床制造厂，上海荣昌泰机器厂……大大小小的各型机械设备，上天入海，有赶上洋务运动的应运产物，也有1919年辛亥革命后的民国产物。假如没有1937年那场窒息扼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面战争，历史也许是另一种走势，然而当历史成其为历史的时候，这就是命定的。在书中，在充满焦虑与灼痛的文字背后，在傅国涌一贯的激情与理性并肩疾驰下，现代工商业的失去传统被一一追寻出来，伴随着泛黄的旧照片，摆放案前。突然想到罗大佑的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此情此刻，最触动我心弦的是那句话，改动后如下，就算你留恋现代光怪陆离的商业化，别忘了被遗忘的历史角落里工商业也有春天。何为现代工商业，传统的徽商、晋商、红顶商人胡雪岩，洋务运动时的官办企业并不属于这一范畴。在一个千年来一成不变的农业社会里，商业屈居于“士农工商”的末尾，直到晚明时期才产生出近代工商业的萌芽或端倪，但仅此而已，即使是鸦片战争启动天朝崩溃的程序，浑浑噩噩的老大中国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闭关生活，冲击仅限于那几个通商口岸，香港不过是弹丸之地弃之如敝履，洋货依然无法对我小农经济下自给自足的市场造成致命性冲击，顶多各地多了几缕鸦片烟，并趁着洋务运动盖起了几家官办工厂，倒也是发展得像模像样，并颇有成效。可是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火山爆发般诱发了国人的忧患意识，从那时起，既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公车上书》，意图从政治、文化上发起一场全面的维新运动；也有“实业救国”的号召响起，旋即付诸行动。至此，现代工商业萌生了，张謇和他的大生纱厂便是战后清政府允许民间设厂的政策产物。傅国涌在书中记传了六位近代企业家，大生集团的张謇，茂新、福新、申新集团的荣氏兄弟，永利碱厂的范旭东，面纱大王穆藕初，火柴大王刘鸿生，民生公司的卢作孚。以这些人和他们背后的企业团体为例，展现了一个星光灿烂的近代工商业图景，沉迷亢奋之后是惋惜长叹，都是过去的事了。昔年的心系乡桑，如张謇至于南通，荣氏兄弟至于无锡，城乡建设不仅仅是大兴土木、铺路搭桥，还有细密周至的社会保障，更深层次观察，是井然有序的地方自治秩序。所以，穆藕初会以巨资助学，在他的付费名单里，列位有着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情、段锡朋、汪敬熙；卢作孚则在抗战的生死存亡关头，日夜不懈，穿梭于长江险滩暗流间，竭力完成了宜昌抢运物资的任务，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斯是人物与事迹，足以彪炳史册，与日月同辉，盖其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如张謇者身负科举功名，同时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弄潮西方新思想新事物，他们与同时期的学者文人一样，都是学贯东西的一代人，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经营理念，使得一切如鱼得水。自然，还有一个

比较宽松的外环境，用哈耶克的话说，那时不存在“一个为了一个明确的社会目标而精心构筑的社会劳动者组织”，因为这个根蔓丛生的幕后原因是一个凌驾一切的国家政策目标，一种集体主义的道德价值体系，它将攥住一切可控制利用的资源不放，于是个人的原创力被计划经济的机械数字褫夺得一干二净。尽管那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那是一块政令不通的土地，但那里有一群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人。1947年，荣德生在无锡一手创办下的江南大学里，华丽的教师名单上包括钱穆、牟宗三、唐君毅、朱东润等人，当我经过今日太湖边上的江南大学时，只见一幢幢外表光鲜钢筋水泥大楼。都是过去的事了，而今还剩下什么，唯有禹作敏的大邱庄，王金忠的南街村在不断挑战惊骇露骨的底线，虚假臃肿的新衣和面具后的苦楚泪水，旧世界化为一片废墟，新世界在高歌猛进的建设中沦为烂尾楼，在满眼的情欲与今生的骄傲纠结间，举目豪车宝马，锦衣夜行，炫耀斗富如石崇王恺之辈，财富正在成为贫穷的敌人，食其肉寝其皮，彼此虎视眈眈对峙，因为财富的背后是强权。工商业也有春天，但那是已经失去的情怀与冷却了的热血所支撑的，时移世易，一切辉煌与荣耀在五十年代的工商业改造的铁拳面前化为齑粉。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成稿于08-11-02

3、七十老翁何所求？——读傅国涌《大商人》傅国涌先生这本《大商人》，以事实的描述为主，着眼于那些带有历史体温的细节，读者可以从多重角度去读，每一个角度都可能找到你想寻找的东西。美国小说家辛格曾说，观点会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过时。《大商人》里面呈现的事实，为我们勾画了100多年前到50多年前中国第一代第二代近代意义上的本土企业家的群像，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及他们之所以是近代意义上的企业家而非传统商人的那种质的变化，这些事实密集的聚合在这本书中，叫人肃然起敬而又有恍然隔世之感。这种企业家精神，原来我们也曾有！同时这些事实也突出的呈现了他们创业的艰难，作为在一个专制国度里生长出来的民营企业，他们一直游走在权力垄断和民间社会的狭窄中间地带，在缺乏制度保障，缺乏社会启蒙，甚至缺乏现代契约意识的条件下，他们游走在权力的狭缝里，像摇摇欲坠的走钢丝者。或许你可以说他们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但这只因为你对他们的处境缺少同情之了解。个中辛酸，岂足为外人道哉？在张謇的实业之路上，官方权力扮演着复杂的两面角色。试与盛宣怀相比，张謇和盛宣怀已经是两类商人了。盛宣怀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官僚，其办实业仅是一种进身之阶，意在官场，而张謇办实业便是其目的本身，用实业带动地方经济与文化的整体发展，甚至达到地方自治。这是张謇的伟大之处，这个人读古书的，从旧体制中走出来，最终能有宪政民主之思想，并对中国的政治进步有重大影响，即便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便无法绕过。所以，盛宣怀这样的官僚企业经营者，虽然也对中国的工商业发生过正面的影响，但其影响仅仅是客观上的，是一种副产品。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应该是从张謇这代人开始的。但这里的所谓“私营企业”，也不是说，张謇办实业就跟官方一点关系也没有。当时，从制度的准备到社会的成熟，都还不构成私营企业普遍的自由成长的基础，中国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权力结构还是大一统的金字塔。事实上张謇办实业本来就有张之洞建议的因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促发力。当然张謇自身认知原因更重要，他开始筹办企业时，已经43岁了。但他多年来目睹官场的腐败，深知依靠老官僚，这个政府无法获得新的生长点，而兴办实业倒有可能是一条兴邦之道。张謇的企业，一开始便跟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联系不是清廷一些政策性的鼓励经商办实业的措施，更多的是经济上的实质性瓜葛。张之洞委任张謇为“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这个头衔会给他一定的方便。刘坤一更是在1897年直接过问张謇办实业事宜，盛宣怀也是筹办时的股东之一。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官方背景在张謇开办大生之初给他的帮助。当然，最后盛宣怀的承诺未曾兑现，张謇筹款仍是十分艰苦，这是后话。但毕竟，张謇的大生公司启动了，翁同龢为之题字：机杼之发动乎天地。从此，通海一带旧貌换新颜，一个崭新的，充满了生命力的南通，逐渐酝酿成长。大生公司后来盛极而衰，原因很复杂。傅国涌先生引用当时人概括大生失败的原因为“二无二差”，曰：无计划，无制度；舆论差，团结差。这些诚然是重要原因，比如其中的制度。对于一个近代化的企业来说，必须有一种近代化的制度来作为保障，企业制度和整个社会制度都有互相生发之作用，大生公司在这个方面做不到，这是先行者的悲剧，我们无法责人太过。时至今日，江浙一带的家族企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与是否建立这个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摆脱家长制，也有深刻之关联。同时，傅国涌先生还发现，晚清到民初，高度集中垂直向下的官方权力对企业的干涉，也给大生公司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因为官僚集团也是投资方，他们需要获得收益。即便在公司资金最为困难的时候，张謇也不会拖欠官方的利息，甚至不惜抽调股本，因而造成企业本身的运转不灵。大生一向获利全分，首先是官利，约定为8厘，这是那个时代企业的通病，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也是如此。但这恰是现代企业的一个要害。弗里德曼曾言，对自由的基本威胁是强制性的权力，不论这种权力是存在于君主、独裁者、寡头统

治者或暂时的多数派。而现代企业需要的正是政治上对公民自由的保障。从张謇对官股的重视程度，可以从侧面看出，官方的一举一动，会对这个所谓的民营公司造成多么巨大的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张謇死于1926年，即此粗完一生事，我觉得他未必不带有遗憾。对荣氏家族来说，垄断权力对于他们的染指和侵害，毋宁说是一场噩梦。荣氏家族本来是开钱庄的，他们建立带有近代化特征的企业集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荣家兄弟，是将生命的全部，托付在了企业之上，积沙成塔，集腋成裘。荣氏家族的黄金时期，出现在晚清到北洋政府这一时间段。其全盛时代，荣德生说，衣食上，我拥有半个中国。这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国际大环境，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中国民族企业获得了第一个飞速成长的黄金时代。其次则在于荣氏家族的经营有方，他们步步为营，不断扩张，从面粉到纺织，都成为当时著名的品牌。再次，此时政府为弱势政府，尚无暇控制民营企业。但树大招风，荣家最大的威胁从来不是来自竞争对手，而是来自官方。1927年，国民党势力到达长江流域，摊派“二五”库券，要上海的华商纱厂认购50万元，荣宗敬时为上海纱厂联合会主席，不愿接受摊派，结果是蒋介石恼怒，密令无锡县政府查封荣氏在无锡的产业，并严令缉拿荣宗敬。经多方斡旋，华商纱厂如数认购库券，才得以解围。这是对荣氏家族的一个沉重打击。到1936年，由于纱贱花贵的日子绵延不止，荣家再次进入困境之中。而宋子文则趁机想吞并荣氏集团。他对荣宗敬说，申新这么困难，你就不要管了。原来宋子文一年前就密谋，要吞并申新，改组成有限公司，而由官方资本来控股。由于银行家陈光甫和李芸侯的坚决反对，宋子文的意图才没有达成，荣家逃过一劫。最蹊跷的是1946年荣德生被绑架事件，索要百万美金的赎人款，后经讨价还价，降至50万美金。此案扑朔迷离，从种种蛛丝马迹看来，后面有军警特的介入，是一起官匪勾结的敲诈案件。经此一案，荣德生骨瘦如柴，加之获得释放后各地军政要员索款借款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穷于应付，荣德生如惊弓之鸟。而这仍不是荣家最惨重的损失，1947年，国民政府以200：1回收伪币，荣家的巨大家产一夜之间贬值。荣德生愤然写到：课税横征猛于虎。这一类面对政府垄断权力的逼迫无能为力的事件，几乎在每一个商人实业家身上发生过。范旭东的久大精盐公司曾遭军阀绑架勒索。刘鸿生的火柴厂一直被宋子文觊觎，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让宋子文得逞。后来宋子文又想吞并他的华东煤矿，亏得刘鸿生聪明，懂得利用宋子文与孔家的矛盾，才幸免于被吞并的命运。穆藕初稍微好一点，大概因为他有很长时间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原因。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学史笔记》中引用霍布斯的丛林学说解释民初经济政治状况，认为被霍布斯称为利维坦的政府权力若成为交易中进行仲裁的第三者，那么它就可能有效地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可惜“中国在寻找解决国家功能两难的途径过程中，逐渐滑向具有一个统一合法的国家暴力的失效，因而出现类似霍布斯丛林的军阀混战局面”。而掌权的军阀，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身上还保留了专制制度的遗毒，他们普遍相信国家机会主义，相信权力和武力。即便商人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於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也是无可奈何，他们在这个博弈中，最终输多赢少。而最有寓言性质的是卢作孚，他白手起家，于1925年在家乡药王庙筹办民生公司，起初连一艘小轮船都买不起，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终成亚洲最负声望的轮船运输公司之一，创造了中国轮船运输史上的奇迹。1938年，他指挥了历史上著名的中国实业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光是这件事他便可以名留青史，永垂不朽。但他也仍不得不周旋在垄断权力的刀锋之下。坚强的卢作孚挺过了军阀割据，挺过了抗战，挺过了三年内战，但是他挺不过1952年的“公私合营”。1952年2月8日，重庆“五反”运动刚开始，卢作孚在临时借住的金城银行家中服用过量的安眠药，自杀身亡，终年59岁。当时的新华社内参用的是“畏罪自杀”这样的词语，而卢死后仅6个多月，民生公司正式公私合营，成为全国第一家公私合营公司，毛泽东曾说：公私合营“要学习民生公司的榜样”。从此，中国私营企业的风流成为绝响。卢作孚这个结局叫我想起用剃刀自杀的明朝思想家李贽，他临死时，用血写了几个字：七十老翁何所求。傅国涌《大商人》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4、艰难时日，人们总习惯从历史中寻求慰藉。唐宋明清烂熟之后，民国亦成为热炒之地，从才子佳人到政要显贵，均已挖掘殆尽，如今大商巨贾也成被史家倾心晕染，希冀从中解出民族商业命脉的秘匙。在说史书籍泥沙俱下今日，傅国涌先生的《大商人》可谓其中佳作。书中截取了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刘鸿生等影响中国的实业家一生沉浮，浸透半个世纪前的沧桑往事。之所以说是实业家而非其他资本家等词语，这除了民国企业实业报国的传统之外，更表示了作者的一种价值取舍，所谓实业家并非仅仅以累计财富作为唯一目的。从宏大历史而入工商掌故，傅国涌有着更

大的野心，在对民国工商业巨头的书写中，他也希望能够借此完成本土工商业传统的一个追寻。他试图回答自己的一个提问：从洋务运动算起，中国的企业史已接近150年，那么中国企业家的根到底在哪里？固然，从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通商银行，以及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等企业来看，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等“官督商办”的传统由来已久，但是这些所谓“官商”仍旧是把商业执为末端，仕途才是他们的终极追求，也就是傅国涌所言“这些企业在他们眼里仍不过是“用”，而不是“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他的目的还是为维护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的集权体制之“体”。”傅国涌将中国的近代企业家群体从出身分为五类：一是以张謇为代表的绅商型，一般源自拥有科举功名与官场背景；二是商人型，以荣氏兄弟为代表；三是买办型，如朱葆三、刘鸿生等人；四是回母土创业的海外华侨，比如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张振勋；最后则是知识型，比如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等人。尤其是最后一个类型，傅国涌尤为欣赏，认为他们在近代企业家阶层中他们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虽然这批人在创业之前既没有官场背景、从商经历、雄厚资本，却以见识取胜。总结来看，民国这批企业家之所以超然同辈，不仅源自他们筚路蓝缕开创了中国新式企业，更在于他们谋事业不忘家国的情操，他们对于立宪、公益等公共活动热情今天看来仍旧令人感慨。回首百年，只有中国的新式企业才是真正转向传统农业格局的告别，南通状张謇弃官从商可能才是挥手告别旧体制。十五岁参加科举角逐，四十二岁的张謇在翁同龢提携下成为状元，达到旧体制读书人的巅峰，但是张謇心有不甘，一次雨中跪迎慈禧的经历已经使得他“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此外，一方面日后他不可避免地卷入“帝党”与“后党”之争，翁同龢的失势难免波及与他，而另外一方面他又有心“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各方面因素最终促使他走上实业之路，1897年创办了大生集团，意蕴取自“天地之大德曰生”。创办企业成功之后，张謇又进一步推进地方自治，尽力将南通改造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造福一方百姓，这算是民国企业家中一个典型。从梳理民国工商历史中，傅国涌赋予企业家四个特征：第一经济创造力，二是核心价值观，三是社会责任感，四是管理制度化。一战的时机成就了中国的民营工业，这截然而止的几十年刹那光华成就了中国历史最优秀的一批企业家，他们的胸襟与视野超越了前人，亦成为后来者的光荣传统。谈他们的成功，也不能不说他们的失败，外因有之，内因亦有之，但是来自政府的盘剥则更令人唏嘘，从军阀到国民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张謇的大生的失败来看，支付大量官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即使筹办期间也不能避免，这还是最明白的一种做法，其它各种赤裸裸手段就更为恶劣，甚至可以直接绑票，解放初期，荣德生不肯离开国内也是因为厌恶国民党“抽税之狠，不知人困”，直言“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还坏。”据说，胡适在张謇死后曾经评价“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也几乎成为民国工商业巨头的宿命讖语。掩卷沉思，这代大商人取得进步均是“得寸进寸”的改良式成功，可惜时不待人，大多折戟途中。新旧交替之际，商业总是最为敏感。民国的大商人蜕变于旧体制，却始终无机缘创立一个新体制，他们的一生也是左右突围而不得，可谓历史的大悲剧。对比今昔，如果我们还在继续沉湎于胡雪岩式的循环，那么也许就是历史的局部退步。

5、卢作孚，穆藕初，张謇等人，不知道几十年之后还有人记得不？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才真正是企业家精神。现在做企业的几个还有产业抱负和社会责任感？不当个奸商已经对得起大家了，唉。

6、《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傅国涌【著】中信出版社 如果问什么时候企业家们开始尝到了翻身的快感，那正是如今做小步总结时。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全国各地媒体与机构都在做一个事——颁奖。比如将中国地产500强的称号颁发给万科与中海，比如将改革开放功勋人物提名给邓小平。各类名目繁多的30年30人榜单（附带N个子榜），最后评选出的其实是300人榜单。一路看下来，不过还是有个规律，当今企业家们于传统的“男三号”的灰溜溜形象并不相配，他们的光鲜衣着，让人明白如今即使不是一号，但至少也是“男二号”。比如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推出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榜单中，企业家一族占据了10席位置；而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中，企业家一族更是占据了20席的位置。 中国企业的历史并不长，百余年而已。傅国涌的《大商人》就是这样一部写这百年历史前半部分的书，为此他花了三年时间做准备。用他人文雅的话来形容傅国涌，那就是，“他并不是财经中人，以前的作品也多与当下的喧嚣无关，但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相对超然的立场，才有可能为我们探究中国企业的成败之秘提供了一个隐蔽而庞大的视角，与其说这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寻根之旅，不如说是为了了断内心的一种情结，还原一段不应被忘却的记忆。”《大商人》从幅制与内容而言，确实为迄今讲述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内容最详实、细节最丰富的一个文本。同时，作者很冷静，在历史的叙述中保持应有的冷静，主观臆断之辞甚少。 作者对记载对象的选取，还是基于一种公认的立场。入选本书中的名单，多是历史上脍炙人

口，得到各类政界、史界大腕所认同的所谓“红顶商人”，依照中国舆论界的“潜规则”，他们不但要会赚钱，赚了后还要“会捐出去”，否则就不是好企业家。面对中国自清末以来生民漂浮的乱世，这批企业家们更应该随时捐躯赠产赴国难。实际上，他们很多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个名单，就包括张謇、荣氏兄弟、范旭东、穆藕初、刘洪生、卢作孚……作者为了掌握更为翔实而原味的材料，对这批中国企业先驱们进行了遗迹的巡访。他首先从无锡开始，访了梅园；在长江北岸的南通，去了状元郎张謇故里；从武汉到成都再到重庆，然后从涪陵经万州，乘船下宜昌，他寻访了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遗迹。对范旭东和“永久黄”事业遗迹的寻访，作者从遥远的重庆五通桥开始，在岷江边好不容易找到了刻有“新塘沽”三个大字的那块石头；在与南京隔江相望的卸甲甸，他找到了范旭东在那里创办了当时亚洲第一流的大型企业——永利碱厂。他北上天津，去了塘沽的永利碱厂；在上海，他又去寻找荣氏兄弟、穆藕初、刘鸿生等人在上海滩留下的痕迹。他的这次寻访，是一份不错的企业家精神的地图指南，或许想有所作为的企业家都该来一次这样的寻访之旅，是励志，更是洗礼。全书内容，正因他的寻访而显得脚踏实地。企业界有句古话，叫做“商之大者，为国为民”。当代的企业家们要拥有完整意义上的成功，或许就需要剔除几分喧嚣，多几分沉静与深入。

7、“...在晚清民国时期，尽管那是一个战乱的、列强虎视眈眈的年代，但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还是晚清，至少还能保障这些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即使到了国民党时代，那些大官僚资本比如宋子文、孔祥熙家族一心想吞并这些大的民营企业，但是最后都没有成功。因为毕竟在制度层面上，还是要保障这些民营企业的生存的。现在好的民营企业最终结果就是两条，一是被国有资本吃掉，一是被外资吃掉。所以民营企业的最大障碍从来不是其他东西，而是面临官家对你的遏制，最后要吃掉你。它在中国的生存处境一直是不好的...” ---傅国涌说《大商人》

8、‘立国于现代世界上，主要在科学，文化各方面打下现代化坚实的基础。政治制度和风气是重要的，但比之前者，没有决定的意义。比如，你们能把《大公报》办成一张真正反映民意，敢言而伸张正义的报纸，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和尊重，那就在舆论界立下了一根坚实的柱子。再如，我们在化学工业方面，力求进步，产品在国际上进入先进的行列，那就在这方面也立了一根坚实的柱子。中国有这样几十根柱子，基础就牢固了，政府好比是一个屋顶，好的屋顶会在这些柱子上牢牢建立，铺盖上去；不好的，它自然安放不住，会垮下来，要重新修造，但不会影响下面的柱子。有了这些柱子，总有一天，会盖好一幢举世瞩目的堂皇大厦。’-范旭东先生，香港，1941年同志们，朋友们，空谈误国，实干立国啊。即使在条件最为恶劣的1941年，范先生仍然如此坚持这执著的追求，可敬可佩。我们各位能不能不总计较自己的收益得失，荣辱宠誉，而扎扎实实地，在各行各业，为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打下那么几根坚实的柱子呢？如果大家都只为了赚钱，而丧失了当年的追求和理想，我们又何来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呢？-读范先生经历有感

章节试读

1、《大商人》的笔记-第10页

1944年，眼看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刘国钧的大成公司与美国签订价值270万美元的订货合同，他自己只有100多万美元，美方同意交货后三年内付清，但需要中国银行担保。宋子文提出的担保条件是：中国银行可以投资大成，但大成要成为官商合办企业才行。刘国钧担心大成被吃掉，婉言谢绝，新机器订单也就成了水月镜花。本书在叙述每个个案时将提供大量的事实证明这一点。1943年，卢作孚曾写过《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文，他孙女卢晓蓉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1999年出版的《卢作孚文集》收入此文时，有一句话被删，大意是：“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时时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我相信，“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和豪门资本对民生公司一而再的觊觎有很深的关系。

= >现在也还是这样.....

自1927年到1949年，以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豪门资本力量，包括资源委员会掌握的官营资本力量，处于绝对强势，荣氏企业、刘鸿生企业、民生公司和永利公司等，几乎所有成熟的大型民营企业，都处在他们的虎视眈眈之下，多次面临被吃掉的危险。这些企业家寻求国外贷款时不仅得不到官方支持，反而常常受到要挟。

= >现在也还是这样.....

我的心中一直有个疑问，近代民营企业在做大、做强之后，共同面临的重大难题首当其冲的是什么？一般都说这个威胁来自外资企业和外国产品的竞争。这里我只想简略地指出一点，对于近代中国的企业家来说，事实上，最大、最致命的威胁还是来自官资和官企兼并的威胁。我们平常说中国近代新式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来自五个方面，包括外资的竞争、政府的软弱、资本的不足、技术的落后和动力的缺乏。这五点，我大致上同意，这也可以概括1927年以前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情况，当时，包括张謇、穆藕初等企业家在内都感叹政府的软弱无力，没能给企业提供有力帮助。而民国时代风气渐开，“公司法”也有了，许多企业为什么还要选择租界或租界附近？甚至连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几个大银行的真正首脑部门，抗战前也一直都在上海，而不是南京。缪云台感叹租界力量之大，其中奥秘不难琢磨。

= >现在也还是这样.....

荣德生的大女婿李国伟回忆，北洋军阀比较容易应付，他们的办法也简单，一般是把各银行、各厂的主持人请去开会，关上门“讲斤头”，不满足他们的胃口，就不让出来。但是，如果你事先看出苗头，可以托故不去，也可以硬挺软磨，讨价还价，到了国民党时代就不行了。蒋介石控制长三角不久，荣宗敬不愿全额接受摊派的库券，就横遭通缉，无锡家产被封。

= >现在也还是这样.....

2、《大商人》的笔记-卢

国民党要钱，共产党要命。

《大商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